

Bourdieu

# 实践理论大纲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高振华 李思宇 译

布尔迪厄作品

Bourdieu

# 实践理论大纲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高振华 李思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践理论大纲/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高振华, 李思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

(布尔迪厄作品)

ISBN 978-7-300-23646-9

I. ①实… II. ①皮…②高…③李… III. ①社会学—科学实践 IV. ①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479 号

布尔迪厄作品

### 实践理论大纲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高振华 李思宇 译

Shijian Lilun Daga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12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7 000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总 序

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以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布尔迪厄的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如果用涂尔干与“常识”决裂的经典视角来解读的话，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象征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尔迪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发现第三个立场的能力，如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和结构、自由和决定论、相对历史主义和普世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积极投入和保持距离等对立关系。正是通过这一能力，布尔迪厄逐渐建立了一种范式，可以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这一范式与反思的原则不可分割，而这一反思的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使客观化主体科学地客观化的过程：对于自我的认知，事实上在这里被视作发表关于世界现实的言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经验研究，布尔迪厄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象征资本的政治学”（其“资本”的概念可以拆分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后又可依照各个相对独立的场域，被界定为相应的特定资本)；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的描述(包括其中的“失败者”和“奇迹般的成功者”)印证了这一点，其象征冲突和象征革命理论(在文学领域通过分析福楼拜来展示，在艺术领域通过分析马奈来进行)也体现了这一点；再如其“实践总体理论”(在分析中呈现为惯习和场域的碰撞)；又如他的“统治关系理论”以及形式繁多的象征暴力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体现(阶层统治、男权统治、殖民统治等)；最后，他未能完成的“场域总体理论”中也呈现了这一点。

今天，布尔迪厄的作品被当代知识界的不同领域使用、引用、讨论和批判，这些领域从教育社会学到语言哲学，再到认识论，还包括了民族学、政治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布尔迪厄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维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则使得其无法被惯用的学科划分方法归类，无法判定其作品只属于某一学科。如果说布尔迪厄确实是一名社会学家的话，则同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他所着手解决的正是一组哲学问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涂尔干的研究路径，后者在20世纪刚刚来临时，尝试使康德的哲学“社会学化”。而布尔迪厄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正如对于他的作品不同形式的采纳和接受所印证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会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乃至认知科学。

出于介绍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几个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尤其是在其作品传播到遥远的国度时会产生障碍。我坚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读者提高逾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虽然这

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布尔迪厄文字中固有的、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难度。即便是内行的读者，也无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出现困难（当然，对于翻译者也是如此）。这一困境与他论述过程的稠密度有关，与其举例的丰富度有关，还因其经常侧面指出其引用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homologie），也因其总是考虑到界定他的论述的有效条件和范围；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异议或者误读，还由于他经常使用为了切断与常识的联系而建构的概念上的习惯用语，更由于他的句子结构总是那么复杂，而这一复杂句式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过程相互联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自省的思想是如何进行的。

布尔迪厄的著作对于外行来说难以接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出于不同的原因，阅读起来也并不容易。除了属于知识分子们自己特有的经院环境以外，布尔迪厄的作品切断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和知识分子与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联系，他摆脱了主体性哲学、存在主义者的人道主义、60年代末以萨特为代表的激进主观主义，也摆脱了无主体性哲学、结构主义下的反人道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所代表的客观主义。与此同时，其著作与文学哲学传统下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至上主义决裂，也与支配着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国社会学所推广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正因如此，布尔迪厄的著作被主观主义者视作“客观主义”，被结构主义者定义为“人道主义”，被经验主义者划分为“理论主义”，并被历史哲学家视作“实证主义”，其著作的接受过程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实的边界和人为的分割所左右，正是这些边界划分着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域，并一直被布尔迪厄质疑

(Brubaker, 1985)。

虽说布尔迪厄的著作具有让知识分子们感到为难的所有特质，但在理解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大概在于把其著作矮化为纯理论著作的阅读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来评论书中的概念，而不是使用它们。对其著作的误解一方面产生于对其研究路径的误读，另一方面来自对其研究意图的错误认识。布尔迪厄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我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Bourdieu, 1993 : 27) 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这些困难，还要加上国际观念贸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碍(Bourdieu, 2002)。除了语言障碍、民族主义障碍、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在知识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会领域要少的问题，还有根植于国际观念贸易逻辑的误解的结构性原因。借鉴了马克思的观念，布尔迪厄用“无上下文的文本流通”来分析这一结构性障碍。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



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与来源地的知识界在距离上的遥远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倾向于把布尔迪厄作品的复杂性归咎于巴黎知识界的特殊性（“法国例外论”）。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断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超越这些障碍意味着采用一种社会衍生学的角度来看待一部作品：超越关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场域的社会学和其中孕育的国家性的思维分类法。在这一视角下，人们应该把这一分类法解释清楚，通过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使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潜意识结构浮出水面，而这正是思维体系的历史基石。这样，我们才可以把社会科学在超越各国内部知识生产场域界限而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误解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一过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减少这些曲解。

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藏在某处”，又因为斗争的输赢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觉得理解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其复杂的句法和晦涩的措辞，不在于知识分子学究式的偏好，亦不在于国际观念市场的内在困难，而在于整个批判社会学事业所带来的困境。对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碰触到的，是或多或少



被牢牢内化的反对所有社会学尝试揭露内情时会遇到的阻力，这不仅仅是有时社会学质疑的一些关键利益，还有常识上的一些模式。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与其说社会学真的是一门除魅或者灭圣的科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门“扰人的科学”（Bourdieu, 1980）。因为它揭露出隐藏在背后的有时被抑制的东西，还因为它经常与统治者的利益相违背，部分由于这些利益隐匿于缄默的表面之下或于情理之后，而情理经常告诉人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且无法是其他的样子。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0, “Une science qui dérange”, in Bourdieu P.,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p. 19-36.

Bourdieu P., 1993, “Concluding Remarks: For a Sociogenetic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Works”, in Calhoun C., LiPuma E., Postone M.,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2002,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 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145, p. 3-8.

Brubaker R.,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 n° 6, p. 745-775.

###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欧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心研究员，该中心为布尔迪厄联合索邦大学的政治科学中心共同创立的。莫热先生曾任教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NS)，曾为“调查—田野理论” (Enquêtes terrains théories) 团队和“跨学科实践” (Pratiques de l'Interdisciplinarité) 硕士项目的成员。

莫热先生学术上的研究领域包括年龄和代际关系社会学、犯罪社会学、文化实践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并有著述十多本，如《年龄和代际关系》(*Âges et génération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15)、《青年犯罪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la délinquance juvénil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09)、《读者的历史》(*Histoires de lecteurs*, Paris, Éditions Nathan, coll. “Essais et Recherches”, 1999)。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他便作为布尔迪厄的合作者参与其团队的科研工作。在布尔迪厄逝世后，莫热先生撰写并组织出版了多部总结整理布尔迪厄学术遗产的论文集，如《遇见布尔迪厄》(*Rencontres avec Pierre Bourdieu*, Bellecombe en Bauges, Pari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05) 和《阅读布尔迪厄》(*Lectures de Bourdieu*, Paris, Ellipses, 2012)。

致阿卜杜勒马利克·赛义德 (Abdelmalek Sayad)  
经常和品德高尚的人往来，你最终也会变得像他一样  
(Addu dusa'dhi, ataghedh disa'dh-is)

## 序

于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见证了布尔迪厄特有的理论结构，特别是早期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惯习概念。在布尔迪厄自己看来，这本书是“一部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著作的前期草稿”。事实上，他十年后正式改写《大纲》，出版了《实践感》这本在他看来最能体现自己思想的著作（Bourdieu, 2010: 263）。其后，布尔迪厄再一次在《帕斯卡式的沉思》（1977）中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大纲》和《实践感》两部著作中已经初见端倪的一整套人类学理论。

这里不是重新建构整个实践理论社会起源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指出两个可能的进路。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 2006）曾努力证明了“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同一视角下，吉塞勒·萨皮罗（Gisèle Sapiro, 2004）分析了惯习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布尔迪厄如何在自己的论述中与萨特、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和戈夫曼（Goffman）划清界限，而接受并融入了莫

斯 (Mauss)、帕诺夫斯基 (Panofsky)、韦伯 (Weber)、卡西尔 (Cassirer)、乔姆斯基 (Chomsky) 等的理论。两位学者在她们的分析中都强调了源流和其他理论的影响。但正如路易·品托 (Louis Pinto, 1998: 72) 提到的: “我们承认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使人们领悟到理论化工作中的实践层面的意义, 此时为这一理论描绘一幅纯理论的图景” 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实践理论大纲》(以及与此书同时出版的卡比尔民族学三种) 中, 理论的构筑产生于对经济活动、婚配嫁娶和卡比尔农民的日常惯例的观察。有一种虽然有些夸张却也不失为事实的说法认为, 布尔迪厄 (2003: 6) “曾习惯说, 事实上, 在这些调研中他已经搜集到了全部资料 (tout trouvé)”。在强调调研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的层面上, 阿兰·阿卡尔多 (Alain Accardo, 2011: 62-71), 作为布尔迪厄和萨亚德在阿尔及利亚调研工作的参与者, 认为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提出的“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这一论调没能抵御住“重回哲学老路”的诱惑 (在这里他并非质疑布尔迪厄铸造的社会理论图景受到德国现象学的影响), 此外他强调, 在他看来, “对于布尔迪厄来说, 为他的理论发现带来启示或起催化作用的, 更多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 而非制度哲学这一歧途”。与此同时, 路易·品托 (1998: 38) 强调在布尔迪厄的一生中阿尔及利亚这段经历作为一个节点的重要性。他写道, 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体现在“发现与哲学家不同的研究课题和不同的视角”, 而且他重申布尔迪厄这一努力是有损哲学家的尊严的, 因其“不仅当认定哲学的统治地位的哲学家们致力于阅读不同文本或以不同视角审视经典文本时, 暗示了与‘田野’ (terrain) 上的实际情况做对照的重要性, 而且他无限期地推迟了使得贴着理论标签的生

产活动可被接受的，证明其超越前者的哲学论述”。这场关于实践理论精神来源的争论可以到此为止，但我们要强调针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调研和布尔迪厄在卡比尔实地调研中的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对于这一理论的影响，以及需要说明引导着这些调研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来自布尔迪厄所接受的哲学训练。换句话说，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确实借鉴了现象学，并且它确实是社会学的欧洲传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莫斯——的继承者，同时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用其著作辩证地反对以让-保罗·萨特所代表的“全能知识分子”形象（Bourdieu, 1980: 8）为标志的50年代法国学术圈的产物，那么这一理论也是一种根植于经验研究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其最初的样子就是布尔迪厄（2002）在贝阿恩省（Béarn）和卡比利亚地区之间奔波所做的实地调研。如此说来，我们大概应该阐明这一关于社会世界“非理论化关系”的理论，得益于“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暗含的伦理学立场和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高高在上的、保持距离的研究关系的深刻拒斥”（Bourdieu, 1987: 31），而这一拒斥本身来自布尔迪厄融入社会世界的实践，来自他对各种形式的唯智论（intellectualisme）的批判，来自其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对贝阿恩和卡比尔农民们生活条件的深入了解。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布尔迪厄（1980: n. 2, 89）看来，惯习概念，加上习得的、永久的、可延展的倾向性体系组成的整体，是史上对这一概念的所有用法，而其最有价值的地方莫过于它通过移除错误的问题和错误的答案而产生更好的提问方式和更好的解答方案，以及揭示由此产生的学科上的困境”。实际上，他旨在对反复出现的、或多或少相互可重合的一些理论取舍做切割，

如瓜分着社会学思考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决定论和唯智论、目的主义和机械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等。因此，大部分惯习概念所针对的旨在使得理论取舍的两方更加对立的批评，都通过不厌其烦地“回到”（其实更应该称作退化到）叙述、行动者和主体等，使得对于知识积累的期待落空。

为确定观点之便，我们可以记下布尔迪厄在《大纲》（Bourdieu, 1972: 256）中提出，并在《实践感》（Bourdieu, 1980: 88-89）中再次强调的惯习概念的定义。其中，他仅仅用一句话就贯穿了至少四个分析框架：作为结构的产物的惯习、作为传播理论框架的惯习、生成实践和策略的惯习和作为实践统筹的惯习。“建构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的结构（大致上就是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特性的环境的物质前提），以及可以通过规律性与社会性建构的环境之间的联结方式来理解的结构，两种结构一起生产的便是惯习，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倾向性组成的系统，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个衍生出实践和意象并使其结构化的原则，同时可以客观地使它们‘有规矩’（réglé）和‘有规律’（régulier），而不需要向规范屈服，这些结构客观适应其本身的意图而不需要有意识地以针对一个目标并为此迅速掌握必需的运作方式为前提，因此，它们在缺乏指挥组织的情况下整体协调起来”。

正如弗朗索瓦·埃朗（François Héran, 1987）所说的，布尔迪厄给定的惯习的定义中，大部分以“双连画（diptyque）的形式把这一概念的被动和主动、之前和之后两方面相互重叠”。正是这样，通过“把被动转化为主动”，“惯习被视作把外在世界内化并使内在世界外化的场所”（Bourdieu, 1972: 256），“被视作生产了



生产者的产品” (Bourdieu & Passeron, 1970: 248), “根据历史衍生出的模式, 生产了个人和集体实践, 也就是生产了历史的历史的产物” (Bourdieu, 1972: 277), “是一个被简化为它所拥有的、它曾经是或者它使得其他事物拥有的存在” (Bourdieu, 1980: 282), “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生产结构能力的结构来发挥作用” (Bourdieu, 1980: 88), “持续存在到当下, 并将在未来中延续的过去” (Bourdieu, 1980: 91) 等。在承认第一个部分 (社会化) 和第二个部分 (实践) 之间的关系并非时间顺序而是辩证关系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梳理作为传播模式的惯习的“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两方面的特性。并不存在两个时段, 一个用于倾向性的内在化, 而另一个紧随其后, 用来实践 (虽然童年早期和最初的社会经验看起来像是原始积累, 是“最初惯习”的内在化过程)。外在化经历的内在化和内在化经历的外在化是同时发生的。所有的经历都同时是外在的内在化, 也是内在的外在化。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 参考文献

Accardo A., 2011, “Les racines algériennes de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Engagements. Chroniques et autres textes (2000-2010)*, Marseille, Agone.

Bourdieu P., 1972,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Éditions du Seuil, 2000].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Bourdieu P. , 1987, "Fieldwork in philosophy," *Choses dite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Bourdieu P. , 1997,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Bourdieu P. , 2002, *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Cris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en Béar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Bourdieu P. , 2003, "Introductio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150.

Bourdieu P. , 2004,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Paris, Éditions Raisons d'Agir.

Bourdieu P. , 2010, Entretien avec Pierre-Marc de Biasi, "Le sociologue et le généticien (suivi d'un entretien avec Pierre Bourdieu)," in Jean-Pierre Martin (dir.), *Bourdieu et la littérature*, Nantes, Éditions Cécile Default.

Bourdieu P. et Passeron J.-C. , 1970, *La Reprodu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Colliot-Thélène C. , 2006, "Les racines allemandes de la théorie de Bourdieu," in Müller H.-P. et Sintomer Y. (dir.), *Pierre Bourdieu, théorie et pratique. Perspectives franco-allemande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6, p. 23-46.

Héran F. , 1987, "La seconde nature de l'habitus.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et sens commun dans le langage sociolog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XXVIII-3.

Mauger G. , 2012, "La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in Lebaron F. et Mauger G. (dir.), *Lectures de Bourdieu*, Paris, Éditions Ellipses, 2012, p. 125-153.

Mauger G. , 2015, "Le style de pensée de Pierre Bourdieu," in Le-